

JINGJI ZHUANXING YU
JUMIN XIAOFEI JIEGOUYANJIN

经济转型与 居民消费结构演进

李振明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经济转型与居民消费 结 构 演 进

李 振 明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责任编辑：沙超英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周国强
技术编辑：董永亭

经济转型与居民消费结构演进

李振明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地质印刷厂印刷

永明装订厂装订

850×1168 32 开 6.75 印张 180000 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册

ISBN 7-5058-2747-2/F·2138 定价：12.5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转型与居民消费结构演进 / 李振明著 . - 北京 :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12

ISBN 7-5058-2747-2

I . 经… II . 李… III . 消费结构 - 研究 - 中国
IV . F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7370 号

序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被誉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是最重要的。首先这当然是因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消费在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最大（一般在 60% 以上）；其次，从根本上说，投资需求不过是消费需求的一种引致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决定的；最后，所谓净出口本质上也是一种消费需求，只不过是来自国外部门的消费需求罢了。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启动居民的消费需求。

然而，居民消费需求的启动又是最难的。这是因为，消费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行为，它不仅取决于居民的收入，而且还受到居民的消费心理、消费习惯、消费预期、居民所处的消费环境、市场的发育状况、国家的消费体制和消费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自 1997 年以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实践表明，居民消费的启动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必须多管齐下，进行“持久战”。

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表明，开展深入的消费理论研究是必要的；而当前我国居民消费迟迟难以启动的现实，则使得对消费理论的研究成为一种十分迫切的需要。李振明同志的这本专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结构演进规律的一项有益的探索。

为了正确地把握中国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规律性，找出阻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的症结所在，李振明同志开拓性地将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制度变迁与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附加制度变迁的居民消费结构演进模型。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实证考察和对价格、产权、投融资、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变迁因素的理论研究和计量分析，作者探讨了这些制度变迁因素对居民的消费集约束、预算约束、流动性约束及消费预期的影响，从而印证了模型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作者通过研究认为，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制约因素，制度变迁的方向决定了转型期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趋势。进而作者指出，扩大内需，提升居民消费结构必须从制度变迁入手，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消费。也就是说，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制约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体制障碍，一味地寄希望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是徒劳的。

综观全书可见，作者的研究视角独特，逻

辑严密，结构紧凑，论述清楚，结论明确，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均不乏创新。当然，本书也并非尽善尽美，比如，因篇幅所限，作者对影响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某些制度变迁因素的研究略显单薄；而且作者对影响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制度变迁因素所作的分类，以及所提出的政策含义等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本书直接脱胎于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作者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该论文曾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一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为作者的导师，对于本书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出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就我所见，这可能是从制度变迁角度研究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第一本系统性专著，是近年来消费经济学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一本力作。希望作者能以此为起点，不断努力，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并郑重向广大读者推荐。

刘方棫

2001年9月15日

导 言

一、问题的提出

自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转型过程。这一转型过程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市场化”或者说“市场导向”为核心的体制转轨，二是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及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发展转型。前者的实质是以实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为基本内容的制度变迁过程；后者的实质则是以实现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现代工业经济、乃至知识经济过渡为主要目标的结构优化过程。市场导向型的制度变迁过程与工业化导向型的结构优化过程相互交织、互相促进，构成了中国经济转型期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脉络。

众所周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与发展过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市场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原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计划体制，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①；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在体制转轨中获得了持续的

^①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教授主持的《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表明，1997 年中国国民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就已超过 60%。

高速增长^①，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质态变化，已进入工业化加速期（刘伟，1992）。更为重要的是，自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以来，长期困扰中国居民的商品短缺现象已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经济的买方市场特征日益明显，近两年来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迹象。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从供给约束型转换为需求约束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大需求因素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

然而，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就净出口而言，虽然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外贸出口年均增长15%左右，对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作为一个外贸依存度已达40%左右的大国，中国显然不可能对净出口（外需）寄予过高的期望，因此，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主要应靠内需的拉动。就内需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和投资而言，消费又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不仅是因为，消费——作为一种最终需求，直接构成了GDP中60%左右的份额，而且是因为，作为一种中间需求的投资，本质上不过是消费的一种引致需求。因此，有理由相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的不断强化和消费者主权模式的确立，消费将进一步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变量。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结构转换和消费需求扩张已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增大。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GDP的弹性系数变化来看，1981~199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① 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达9.7%，居同期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率之冠。中国在渐进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实绩似乎很难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加以说明，这种不一致的局面被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Nolan，1993）称之为“中国之谜”。

对 GDP 的弹性系数为 1.039，而 1990～1997 年该系数上升为 1.068，即在 80 年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可影响 GDP 增长 1.039 个百分点，在 90 年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可影响 GDP 增长 1.068 个百分点，90 年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 GDP 增长的贡献平均比 80 年代增加 2.8%；再从消费额对国内生产总值支出额（GDE）的弹性系数变化来看，1981～1990 年，GDP 构成中消费额对 GDE 的弹性系数为 1.014，而 1990～1996 年则为 1.067，即 80 年代消费额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可带动经济增长 1.014 个百分点，而 90 年代消费额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可带动经济增长 1.067 个百分点，90 年代每年消费额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平均比 80 年代增加 5.2%。以上弹性系数分析表明，90 年代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 80 年代^①。可以预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入，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导向和制约作用将会继续强化。

但是，当前我国消费市场的形势却并不乐观。首先是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趋缓而税费负担沉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较大且消费环境不良、基础设施短缺，农民消费“有心无力”，农村市场难以启动；其次是城镇居民消费预期恶化且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整体消费倾向偏低，而住房、轿车、信息、教育等新的消费热点有效供给不足且受到一些过时的抑制消费的政策措施的束缚，使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受阻，消费增长难以持续。

由此可见，要想使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来自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心理的等多方面因素对居民消费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的制约，以促进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为此，就必须深入研究我国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找出影响和阻碍居民消费

^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中国证券报》1998 年 5 月 5 日。

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的症结所在，以更好地发挥消费在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中的枢纽作用。

另外，从消费经济学自身的理论发展需要来看，虽然消费结构研究一直以来居于消费经济学的核心，但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实证描述、影响因素的分析和对未来消费结构变化趋势的预测，集中于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角度探讨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作用和制约作用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集中于从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出发所作的政策建议等等，而迄今为止，从转型经济学或者制度变迁理论的角度，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经济过程中的消费结构演进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空白。如果我们认定，中国经济转型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的话，那么，研究这一特定转型时期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问题而忽略对制度变迁及其对居民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的分析，恐怕就是一个不应有的疏忽。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选择集合和行为方式。因此，对制度因素的忽略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对中国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规律性和变化趋势的把握，进而甚至可能误导我们的政策主张。因此，加强对转型消费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丰富和发展消费经济学的一个迫切需要。

综上所述可见，从经济转型的角度对居民消费结构演进问题进行研究，不但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顾名思义，本文的标题即界定了研究的主题——中国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结构的演进问题。换言之，本文将把中国自改革开

放以来、迄今为止仍处于进展过程中的经济转型时期作为时空背景，把这一特定时期的居民消费结构演进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制度变迁和结构优化互相融合的角度来展开论文的分析和探索。

应当指出的是，在经济结构理论中，相对于产业结构的研究而言，消费结构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成熟度远不如产业结构理论。通过对产业结构理论史的简要考察不难看出，这其实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发展背景和体制背景的。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根源于战后日本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赶超所进行的经济实践。为了尽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些后起国家便寄希望于通过国家的行政干预和政策诱导，促进产业结构按照经济史演进的规律迅速地实现高度化，进而推动以现代产业体系为基础的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理论上这些国家就不能不重视产业结构演进命题，在政策上也就不能不关注政府如何引导产业结构演变的问题。在我国，由于计划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政府调控有着约束力强、覆盖面广的特点，因此，结构问题一直以来就与总量问题合并在一起，成为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的基本问题，成为宏观调控的对象。

但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由于产业结构的形成更多的是微观经济单位市场活动的结果，具有自然演进的性质，较少受到政府直接干预的影响，因此，在西方正统的宏观经济学中，产业结构问题是被排除在外的。产业结构理论在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国家受到的不同的重视程度，从一个侧面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产业结构理论和政策产生的效力越小。经验考察表明，即使在中国这样崇尚产业政策的国家，由于缺乏有效传导产业政策的市场机制，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也并不乐观，结构失衡问题不仅未因产业政策的实施得到根本扭转，甚至某些方面还有加剧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决策的分权化模式逐渐形成，这种分权化的决策模式使产业政策的实施往往由于不能及

时地与经济中的需求方面，特别是消费结构的变动有机协调，因而很难达到所期望的资源配置效果，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扭转结构的失衡。事实上，由于消费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从动态的角度看，作为供给方的产业结构的失衡就是难免的，甚至是绝对的了，均衡反而是相对的、暂时的，产业政策的目的不过是把结构失衡控制在不至于严重威胁经济发展的程度而已^①。

然而，传统计划经济国家在实现经济赶超的压力下，不可能正确认识（或者无暇顾及）产业政策的局限性，因而必然导致对产业政策的迷恋和对消费结构政策的忽视。另一方面，在计划体制下，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通过计划投资来实现，而作为众多偏好各异、收入水平各异、消费决策方式各异的消费者理性选择结果的消费结构，却是无法计划的，因此，这种宏观调控上的困难，客观上也造成了对消费、消费结构理论研究的忽视。因此，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消费结构，往往是作为产业结构的决定对象、作为收入分配的结果被动地存在着。在这种情形下，消费者的个性消费也异化为计划的一部分，消费者的个性行为在消费结构形成中的核心作用消失了，消费结构演进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导向性和制约作用也被视而不见。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才从根本上恢复了消费的理论地位和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中的枢纽作用。早就为马克思所精辟论证了的“生产与消费的直接统一性原理”才重放异彩，成为指导消费经济研究和市场经济实践的理论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因为消费天生属于市场经济^②，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消费和消费结构问题的研究才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① 详见江小涓：《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中对中国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案例研究。

② 消费和市场都崇尚分散的自主决策，而且从根本上说，市场不过是消费者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消费需要而进行的一种制度创新而已，因此，我们认为消费天生属于市场经济范畴。

当然，上述论断决无意否定产业结构的重要性，静态来看，现存的产业结构状况仍然是前提，决定着当前消费结构所可能达到的高度。但从动态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需求的结构则决定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方向和进程。因此，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研究消费结构必然要联系产业结构，反之，亦然。不仅如此，由于消费结构研究和产业结构研究一样，同属于长期分析，而不是短期分析，同样具有结构性和过程性的特点，因此，产业结构理论中一些常用的研究方法，如经验归纳法、实证比较法等，也一样适用于对消费结构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就借鉴了上述方法，特别突出地运用了经验实证（empirical study）的方法。

与此同时，本书还尝试着运用了理论实证（positive study）的方法，希望借此打通西方经济学与消费经济学之间对消费问题研究的隔阂，为消费结构研究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另外，由于本书的研究是在发展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应用性研究，所以本书也大量使用了这两门学科的一些理论范畴和分析方法，虽然这种尝试可能充满了误入歧途的风险。

三、主要理论创新

本书的主要理论创新表现在：

（1）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角度系统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规律性、特殊性和影响因素，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附加制度变迁的消费结构演进模型；

（2）系统总结了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并实证性地研究了这些经济效应对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影响；

（3）从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角度预测了居民消费结构的演进

趋势；

(4) 重新界定了消费结构的理论内涵，将消费储蓄结构和消费支出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消费结构研究得以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丰富成果走向深化；

(5) 全书贯穿了逻辑实证和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通过理论和经济计量分析，最后提出的政策建议能够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避免先入为主、妄加价值判断。

总之，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分析和研究，第一次给出了转型期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制度经济学解释，希望能对全面理解转型期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规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四、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本书的研究思路如下：

(1) 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行为的分析，建立一种基于制度变迁的居民消费结构演进机制模型；

(2) 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实证考察，检验消费结构演进机制模型的适用性，并对转型期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规律性和特殊性进行归纳和总结；

(3) 通过对价格制度、产权制度、投融资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主要经济制度变迁的分析，来具体研究上述制度变迁因素对转型期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影响，从而展开对模型的详细检验；

(4) 根据消费结构演进机制模型，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出发，分析和预测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一般趋势；

(5) 以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为目的，提出下一步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本书的框架结构安排是：除导言和结语外，全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特征，详细讨论了制度变迁因素对消费者最优化消费决策行为的影响，并进而通过中国经济转型前后消费结构演进机制的比较，建立了一种基于制度变迁的消费结构演进机制模型。

第二章从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增长实绩出发，研究了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实证地检验了消费结构演进机制模型的逻辑推论。

第三章研究了生产者强相关型制度变迁^①，即价格制度、产权制度、投融资制度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变化，总结分析了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及其对消费者选择行为、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而探讨了对消费结构演进的制约。

第四章研究了消费者强相关型制度变迁，即劳动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和市场化，对居民消费支出行为和消费结构演进的影响。

第五章探讨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现象及其对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影响，并根据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一般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结语通过对全文的归纳和总结，从规范研究（normative study）的角度，提出了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和体制改革建议。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的经济转型尚处于“进行时”，实践尚未得以充分展开，因此，本书的研究也必然具有过渡性的特点。同时，由于从制度变迁角度对消费结构演进的研究在消费

^① 生产者强相关型制度变迁和消费者强相关型制度变迁是笔者为了分析的方便而提出的两个概念，前者主要指与生产者相关度更高、主要在于影响生产者的市场行为的一类制度变迁，后者则主要指与每个消费者息息相关、可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更为直接影响的一类制度变迁。应当指出，这两类制度变迁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将这种划分绝对化将是错误的。

经济学研究中尚属空白，再加上笔者学识所限，因此，本书的研究必然只是探索性的、甚至是幼稚的。笔者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它能成为一块“引玉之砖”，吸引更多的人开展转型消费理论的研究。